

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研究

郭 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市 100871)

关键词: 先秦; 墓上建筑; 源流; 等级

摘 要: 本文对先秦时期的墓上建筑进行类型学分析, 总结了各时期墓上建筑的特点和分布状况。商代已出现墓上建筑, 但为数很少, 与等级无关, 其源头还不能找出合理的答案。西周除商系前掌大墓地极少数西周早期墓葬沿用墓上建筑外, 其他地区基本不见墓上建筑, 北吕 VM301 属孤例。墓上建筑的再度出现为春秋时期, 见于雍城秦公陵园, 战国时期在三晋地区流行开来, 但其他地区不见。东周时期采用墓上建筑的, 均为高级贵族。

Key Words: Pre-Qin Times; aboveground tomb-structures; origin; hierarchy

Abstract: Through a typological study of Pre-Qin aboveground tomb-structures the present paper sums up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type of tomb-structure rose in the Shang Period, but it is recorded in a small number and is not concerned with hierarchy, and there has no rational solution as to its origin for the time being. In the Western Zhou, only a few early graves in the Qianzhangda Cemetery that belong to the Shang system are furnished with aboveground tomb-structures; and on the whole, on superstructures have been on the tombs of the other regions except for Beili-VM301 as the only special vestige. The second time of appearance of aboveground tomb-structures was in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as recorded in the Duke Qin tomb-garden at Yongcheng.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type of tomb-structure prevailed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Han, Zhao and Wei states, but no evidence has been in the other areas. In all cases the Eastern Zhou tombs with superstructure are burials of higher-rank aristocrats.

墓上建筑是指在墓室垂直上方的地上营造的建筑, 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对于墓上建筑的研究由来已久, 多集中于对个案性质的讨论。目前经考古调查发掘的墓上建筑数量较多, 有必要作较系统的梳理, 并探讨其形制、特征、源流、性质等问题。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 对先秦时期的墓上建筑进行讨论。

一、墓上建筑的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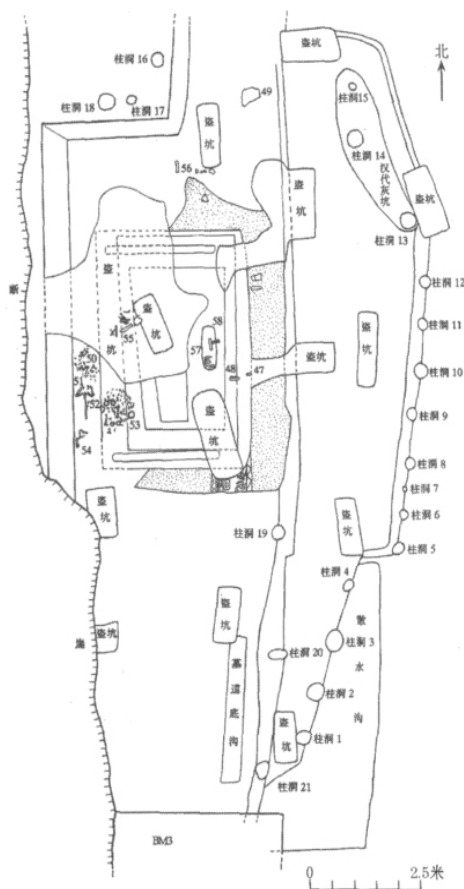
墓上建筑根据其修建的位置与特征, 可分为 A、B 两类: A 类为平地起建, B 类于坟丘上起建。

A 类 平地起建的墓上建筑。所谓平地起建是指建筑的最低活动面 (如建筑外散水面) 与当时的地面约等高。因建筑本身

排水等需要, 此面必然稍高于周围地面。至于建筑内的活动面, 有的还会略高于建筑外的活动面, 但远没有坟丘那么高。此类又可分为中字形、甲字形、长方形、方形、圆形等几种。

1. 中字形 这种形制的墓上建筑建于有两条墓道的墓室和墓道之上, 形状略呈中字形。属于这种类型的墓上建筑有滕州前掌大 BM4 和凤翔秦公陵园大墓 M37 等。

滕州前掌大 BM4^[1] (图一) 位于遗址北 I 区西北部, 方向 5°, 属商代晚期, 有南北两条墓道。北墓道北端和南墓道西壁均被断崖破坏。墓葬虽遭破坏, 但由现存的情况看, 此墓东西不对称, 南北不平衡, 形制与商周时期常见的“中”字形墓葬不完全相同。东侧墓口墓室与墓道分界不明显, 近乎



图一 前掌大 BM4 平面图

一条直线：西侧墓口北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宽约 2.65 米，而此处墓室宽至少 5.54 米，即墓室北端口线由墓道向西约垂直扩出 2.89 米。南墓道西侧被断崖破坏，与墓室交接处不明。由平面图看，即使墓室亦从墓道处向西扩出，也远不及北端那么多，大致有若南墓道东侧与墓室之关系。整个墓口的形状，很不规整，正如发掘报告所说“这种不规范的墓葬形制，是过去不曾见过的”。

墓上建筑遗存包括墓口外侧的台基基底、柱洞、石础、散水等设施，同时在墓室、墓道底部也发现有柱洞。墓口边圻东侧外围清理出为埋柱而专门挖成的沟槽，南北长 10.90 米，与墓口边圻相距 3 米。在墓口外及其底部共发现 21 个柱洞，除墓室内东

南角底部有 1 个柱洞、南墓道内东侧底部有 2 个柱洞外，其余 18 个柱洞均在墓口之外，其中南墓道口东侧有 4 个，墓室口东侧有 11 个。因北墓道存留较短，墓道口东侧未见柱洞，而北墓道口西侧与墓室北壁外有 3 个。另外，南墓道口外围 4 个柱洞的东侧还有散水设施，散水设施北端浅，愈向南愈深。由于南墓道西壁被断崖切去，墓室口西侧紧临断崖，故墓室与南墓道西侧柱洞如何排列，已无法得知，推测应与墓葬东侧近同。

根据墓葬地面周边保留的 18 个柱洞，以及相关的散水遗迹等，可知随着墓葬的埋葬完成，又在其上营造了墓上建筑。虽然墓葬遭破坏，但根据残存的部分推测，BM4 上的墓上建筑与墓室、墓道的形制应大致相同，即墓室之上部分宽，墓道之上部分稍窄，约呈中字形。

东周雍城秦公陵区共发现 14 座小陵园，共有各种形状的大型墓葬 48 座，其中中字形墓葬 21 座，绝大多数墓葬的地面上发现绳纹瓦；另有一座甲字形墓葬上也发现瓦片；而凸字形、目字型墓葬上均未发现瓦片^[2]。

Ⅺ号陵园 M37^[3]（图二）是一座中字形大墓。据钻探和局部试掘得知，该墓东西全长 166.30 米，墓室口部外侧铺设卵石散水，并向东西墓道各延伸 19 米，平面呈“中”字形。东西墓道都是近墓室一端宽，远离墓室的一端窄，即墓道南北壁不平行，而墓道南北两侧的卵石散水则是平行的。如此，散水与墓道形成 4° 夹角。东西墓道北侧散水各有一个宽 2.80 ~ 3.40 米的缺口，似为两门门道。散水东西全长 72.80 米，宽 1 ~ 1.20 米，外低内高，其东西两端没有闭合，东端间距 16.20 米，西端间距 14.40 米，其内均有厚 0.05 ~ 0.12 米的踩踏面。此外，在散水中部——墓室正中之上东西长 23.80 米、南北宽 16 米的范围内有黄色夯

土墙基。墙体厚度不一,布局不明,唯夯土范围正中,有一夯筑的长方形封闭空间,似为整个建筑的中心。另外,“在试掘方内的散水石面上,有厚约 0.30 米的各类瓦片,表明原来墓上建筑曾覆瓦”。

M37 墓上建筑仅试掘清理出墓室西北角的散水,试掘面积 9 平方米。上述其他信息均依钻探得知,尤其是散水内的夯土墙基,难以探知准确,得出布局不明的结论可以想见^[4]。但无论夯土墙布局如何,这一现象告诉我们,M37 墓上建筑在散水以内筑有夯土墙是可以肯定的。由散水前后左右的跨度推知,散水以内还应有柱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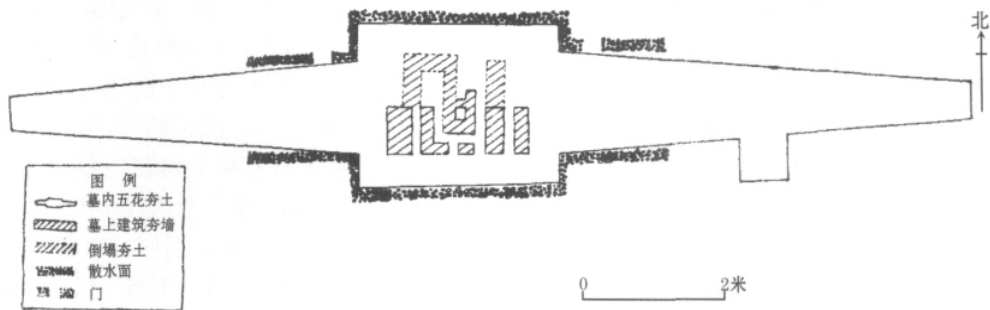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现象与分析,M37 墓上建筑呈东西向中字形,其内有柱,有墙,上有覆瓦的屋顶(或局部覆瓦)。北面开有两个门,分别位于东西墓道近墓室处。此外,建筑的的东西两端是敞开的,也可视为东西大门,因在这个部位发现有踩踏面^[5]。

I 号陵园的 M1^[6] 经过发掘,墓室东西各有一条墓道,整体亦为中字形,全长 300 米。墓室以上地面发现许多春秋时代的筒瓦、板瓦。由于大部分已破坏,只在墓室与东墓道相接部位,清理出一排柱洞,并见凹字形板瓦互相衔接叠压的现象。墓室的西端上部,发现长 0.82 米、直径 0.21~0.28 米的绳纹水管一列。水管大头在北,说明水向南排泄。2009 年对雍城六号陵园的复探中,又在 M15^[7] 这座中字形大墓上,发现夯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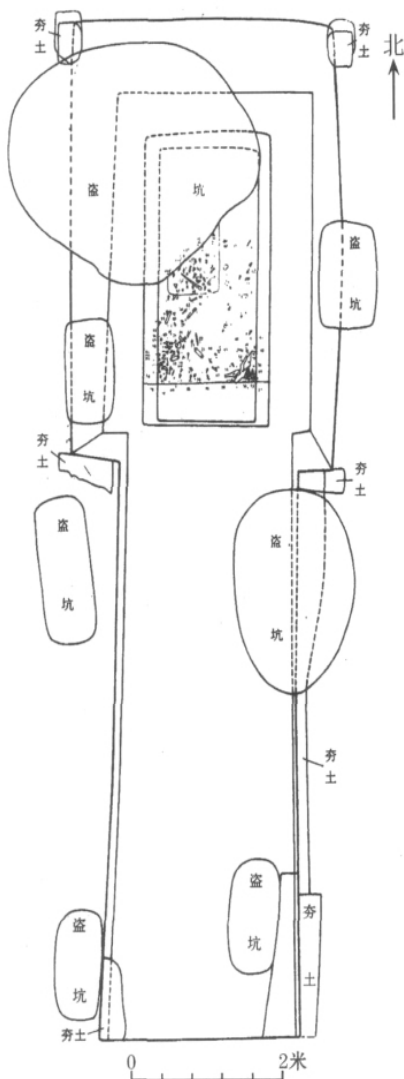
建筑遗迹与瓦片等遗物,可能也有墓上建筑。总之,雍城 14 座秦公陵园中的中字形墓葬均营造有墓上建筑,部分甲字形墓葬亦营造墓上建筑。

2. 甲字形 墓葬呈甲字形,有一条墓道,在墓室、墓道之上建一座与墓室、墓道大小相近的甲字形建筑。属于这种类型的墓上建筑有滕州前掌大 M205、雍城 XIII 号秦公陵园 M41^[8]。

滕州前掌大 M205^[9] (图三) 南北向,属西周早期,墓道朝南。墓室的四角及墓道南端东西两侧口部地面上相对应的位置,有规律地保留有 6 片夯土基础。其中墓室西北、西南、东北三角地面上的夯土均覆盖在折角之上。西北角夯土基础南北长 0.60 米,宽 0.36 米;西南角者东西长 0.74 米,宽 0.40 米;东北角者南北长 0.54 米,宽 0.36 米。墓室东南角的夯土基础则在折角外侧,东西长 0.60 米,南北宽 0.34 米。这些夯土基础现存厚度 0.10~0.20 米,都选用较纯净的黄土,和墓葬填土有较大的区别。墓道东壁从与墓室衔接处开始,由底至口,筑一道南北长 5.10 米、宽 0.14~0.36 米、高 0.70~2.98 米的夯土墙。经解剖得知,此墙是为阻挡墓道以东的流沙层而修筑的,也是墓上建筑的组成部分。其上残存一个圆形柱洞的四分之一,复原口径约 0.68 米,深 0.15 米。墓道南端东侧缘上也叠压着一片夯土基础,南北长约 0.98 米,宽约 0.50



图二 XII号陵园 M37 钻探平面图



图三 前掌大 M205 平面图

米，厚约 0.20 米。墓道南端西侧夯土基础的范围，报告没有介绍尺度，依平面图看较东侧者稍小。

根据上述六片夯土基础分布的位置以及墓道东侧夯土墙诸遗迹现象，报告推测该墓葬完毕后，在其上营造有一座建筑物。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从图上看六块夯土的位置与形状，位于中间的两块，也就是墓室南端两块与南北两端另外两组四块有所不同，即中间两块均作东西向长方形，即东西长，

南北窄，而另外四块相反，作南北向长方形。如果据此复原墓上建筑，最大可能是甲字形。因中间两块夯土各自的外半与北端两块夯土可以组成一个覆盖墓室的长方形；各自的内半与南端两块夯土组成另一个覆盖墓道的长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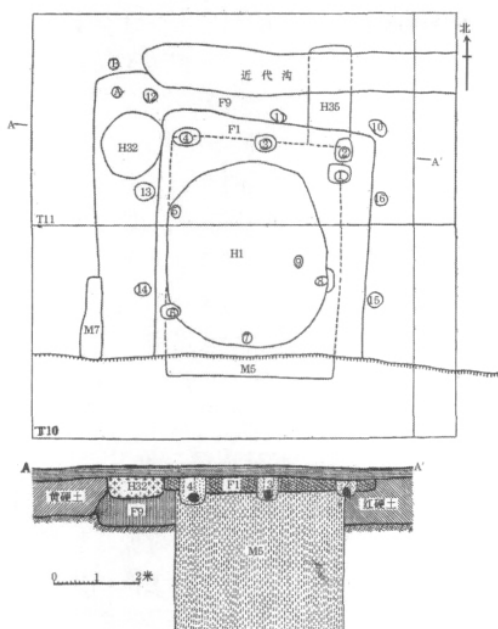
据前掌大报告，该墓地“有多座墓葬存留有柱洞、夯土基础和础石等，根据其分布状况和排列位置，应是分别建在这些墓葬上的房屋，而且一般多是将墓室和墓道覆盖其下”^[10]。属于商代晚期的有 M215，属于西周早期的有 M203 和 M206，均为甲字形墓，因建筑遗迹保存差，详情不明，据墓圻形状暂归此类。

雍城秦公陵园共发现甲字形大墓 3 座，其中 XIII 号陵园 M41^[11] 在调查中也发现地面有绳纹瓦，根据此陵园其他有墓上建筑的墓葬现象推测，这座墓葬也有墓上建筑。因没有钻探和发掘，详情不明。

3. 长方形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在其上建一座与墓圻口大小相若的建筑，如殷墟妇好墓、安阳大司空村数座墓葬、浚县辛村 M1。

妇好墓 M5^[12] 为长方形竖穴墓，墓口南北长 5.60 米，东西宽 4 米，方向 10°。其上营造一座建筑——F1。此建筑南边被断崖破坏，南北残长 5.50 米，东西宽约 5 米，东边线方向为 5°，但从平面图上看，其整体方向与墓葬相当，范围稍大于墓口。（图四）正如发掘报告所言，此建筑“大小不仅与墓葬大体接近，而且恰恰坐落在墓口之上”，它和墓葬同时被属于殷墟第四期的大灰坑 H1 打破，均早于殷墟第四期。

建筑房基面上有排列较规整的柱洞 6 个，口部多呈椭圆形，个别近方形。洞内大多保存有白色木柱灰，洞底均有河卵石柱础。另有三块础石因扰动下陷。依保存较好的北半推测，被破坏的南边缘处也当有 3 或 4 个柱洞。



图四 妇好墓平面图

1~4、6、8. F1 柱洞 5、7、9. F1 础石
10~16. F1 夯土柱基 A、B. F9 柱洞

在房基外侧东、西、北三面皆有成行的夯土柱基，北边3个，其中一个居正中，另两个位于建筑房基西北角和东北角外侧，分别与房基东、西两侧各自的两个柱洞基排列在同一直线上，东、西柱基基本对称。柱基多呈圆形，系先挖柱窝，经填土夯打而成，可能是擎檐柱的柱基。房基东边有路土，推测门道可能向东。

安阳大司空村共发现3座墓上建筑基址，发掘于1953年^[13]。三处建筑基址分别编号为遗址一、遗址二和遗址三，属同一发掘区（东区），相距较近。发掘报告概括称三遗址大体相同，残存有夯土地基和作柱础用的卵石。其中遗址一有较详细的介绍，但没有发表图像资料。报告仅说该遗址下有三座墓葬，至于遗址一与三墓葬的平面分布关系，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难以肯定遗址一是三座墓的墓上建筑。对遗址二和遗址三，报告发表有平面图和照片，但文字描述又比较简单。现将遗址二和遗址三图像与文字信

息结合，并参考与之特征“大体相同”的遗址一的信息，分别概括其状况如下。

发掘报告称遗址二（图五）“形制与遗址一基本相同，只是没有阶梯”。由平面图看出，遗址二压在M311上面，除其东南角少许外，四边都超出M311的边圻，且二者方向基本相同，若以各自西边计，均接近于正方向。M311南北长4.80米，东西宽4.40米，在无墓道的墓葬中，属于较大的。遗址二夯土东西长7.40米，南北宽6.80米，近乎方形，在夯土上有卵石10块，其中2块被盗墓者扰乱，移动了原来的位置，其余均排列整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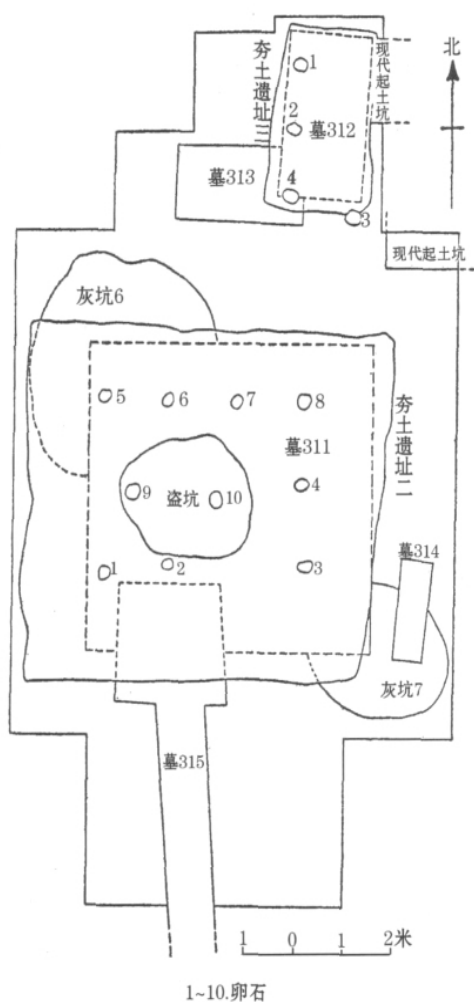
遗址三在遗址二北边2.25米的地方，下压M312。其东边北半部被现代取土坑破坏，由保留的大部分范围可知，遗址三的四边也都超出下压墓葬M312的边圻，且各边超出的宽都比较接近，因而，二者的方向也基本相同，约北偏东9°。M312南北长3.30米，东西宽1.80米。遗址三夯土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20米。在夯土上有础石4块，其中西面3块南北在一条直线上，靠近夯土西边并与之方向一致；另一块被近代扰土坑破坏，移动了原位。依西边三块的位置，可知原础石至少有6块，即靠近夯土西边和东边各3块，东西对称，东边北面两块被现代取土坑挖掉了。

对殷墟发现的以上三处墓上建筑，学术界多认为是可信的，但也有疑问，如殷墟遗址经发掘的墓葬已数以千计，何以仅此数例？而且王陵上都没有发现。本文亦认为应该是墓上建筑，理由有三：

第一，建筑基址的范围普遍大于墓葬，且四边超出部分基本相当。

第二，建筑基址与墓葬的方向基本相同。

第三，建筑基址与墓葬约当同时。对此，发掘报告都没有提供直接证据，需稍加论证。关于妇好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属殷墟



图五 大司空村遗址二平面图

第二期^[14]，不仅铜器如此，所出的一件陶爵亦如此。至于其上建筑 F1 的年代，因报告没有提供建筑使用时期的遗物，该建筑是否与墓葬属同期，无法确定。但该建筑和妇好墓同被一大灰坑 H1 打破（见图四），灰坑堆积中出有大量陶器，报告确定其属于殷墟第四期。也就是说，灰坑 H1 是在殷墟第四期时废弃填埋的，其始建及使用年代约早于或相当于第四期。如果 M5 墓主果真是武丁夫人妇好，这样的人物在其下葬后决不允许在其墓上挖坑破坏（即使比她身份低的贵族墓葬，也当如此），一定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在无人守护、无法辨识、甚至已不清

楚这里还有妇好之墓的前提下，才会有在其墓上挖坑的活动。这一过程相当于从殷墟第二期下葬开始，经过殷墟第三期，到第四期某一时候挖坑的破坏事件发生结束^[15]。作这样的理解是合情合理的。妇好墓墓上建筑 F1 若不属于墓葬的组成部分，即二者完全不同时，这等于说该建筑也是在不知下有妇好墓的情况下建造的，其建造时间又早于殷墟第四期 H1 的时间，考虑到房子建好后也要使用一段时间才能废毁，那它的建造时间就会距墓葬下葬的时间很近。二者既不同时，又相距很近，很难理解。唯二者同时，方顺理成章。大司空村的两例墓葬（M311 和 M312）与各自墓上建筑（遗址二和遗址三）的时代更难确定。M311 规模很大，但因遭盗掘未留任何遗物。所幸 M312 尚有劫余之物，尤其是保留一组陶器，计有簋、盘、豆、鬲、罐、爵、觚^[16]。其中爵与觚是分期最准确和容易把握的器物。虽然 M312 的这些陶器发掘报告没有发表图像资料，但报告整理者对所有墓葬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统一分式，每式都有标本图像发表，没有发表的器物，则在墓葬陶器登记表中注明所属式别。M312 所出爵和觚都属 II 式，比照发表的 II 式爵和 II 式觚的图像，知其时代相当于殷墟第二或三期。M312 之上是建筑遗址三，再上的文化层堆积，报告也没提到。但其南不远的遗址一建筑之上有文化层堆积的介绍，即第一、二层为现代层，第三层是近代扰动层，第四层所出陶片等“都是殷代的”，应为殷代层。而遗址一“就在这一层的下面”。看来，遗址一建筑废弃后，这里还有商代人活动，最晚相当于殷墟四期。遗址一下压三座墓葬（M301、M302、M307），都出有陶器，其中爵和觚分别属 I 式和 II 式，即约与 M312 同时，相当于殷墟第二或三期。若遗址三与遗址一的堆积相同，则遗址三的情况与妇好墓墓上建筑的情况类似，只有与其下 M312 同时才会

理。

总之,上述殷墟三例墓葬及其上之建筑,各墓与其上的建筑都应当是同时的,墓上建筑在晚商时期确实存在。

浚县辛村 M1^[17] 发掘于 1931 年,可谓中国近代考古学创始时期最早发掘的西周墓,也是迄今为止经发掘的墓室规模最大的西周墓葬。此墓属西周早期,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向。发掘报告称“此墓建造甚坚,全部填土都是黄色夯土。上口之外,更各向外扩筑夯土,宽 2.50 米、厚 1.50 米,土色与墓室内同”。“此墓是辛村发掘的第一座墓,毫无经验。这座墓又在墓室范围外增筑 2.50×1.50 米宽的夯土,工作费了几天工夫,尚不得要领”,后改为先掏清盗穴,再由下向上始发现墓壁。“在墓室范围外”增筑夯土,而且土色与墓室内相同。对这样的描述,有学者理解为可能是在墓室之上有夯土,即所谓“封土”,也可能是墓上建筑的残存^[18]。但也可理解为不全在墓室之上,大部应在与墓室口部等高的墓室外围,这可在发掘报告对辛村墓地 M20 的描述中找到答案。发掘报告说 M20 “是一座上半截椭圆、下半截长方的竖穴墓。察其原因,是因为此墓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灰土穴深厚,四壁边沿不清,容易下圯,故扩大为椭圆形。由此证知第 1 号大墓所以上口外各扩筑出 2.50×1.50 米宽厚的黄土边沿,亦因它葬在龙山文化灰土层中,非夯筑不能保持边沿坚固,并不全是掩覆墓口,为防盗掘”^[19]。可见,两墓墓口外扩筑的夯土“并不全是掩覆墓口”的。实际上,发掘报告对墓口以上究竟有无夯土,如有又有多厚,都没有明确介绍。所有描述都比较含混。由于初次发掘西周大墓,缺乏经验,在开始遇到 M1 墓中夯土时,发掘者对夯土的性质认识不一。一种意见以郭宝钧先生为代表,认为是墓葬填土;另一种意见以马非百先生为代表,认为此夯土地近淇河,应是防河水泛

滥的河堤。故当时工地上一度有“郭公墓”、“马公堤”之说^[20]。说明在开始遇到夯土时,并未明确划定其范围,没有及时划出墓口,以致“费了几天工夫,尚不得要领”。因此,辛村 M1 墓室之上有无夯土、有多厚夯土、是方形还是长方形?当时都没有搞清楚。这里姑且按可能有夯土或墓上建筑对待,列出供参考。

此外前掌大 M207^[21]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四角外的地面上也发现了柱洞。受发表材料的限制,M207 的墓上建筑形制尚不明确,可能为长方形。

4. 方形 在墓室之上修建平面略呈方形的建筑,如辉县固围村 M1、M2、M3^[22]。此三座大墓均为中字形双墓道墓,东西并列,应为夫妇并穴合葬。其规模是关东地区经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周代墓葬,具体年代约当战国晚期。

由于历代盗掘,墓葬都破坏严重,但墓上方形建筑尚有不同程度的残留,它们都位于墓室正上方,或与墓室之口相当,或较墓室之口稍大。

M1 在墓室上口,依墓口四边,用小石板铺砌有口字形散水,内边南北长 18.80 米,东西宽 17.70 米,即与墓口同大小。各边宽度相等,约 1 米,内高外低。其中南面中部未铺散水,为宽 2.60 米的门道。散水以内约 0.50 米处残存 11 块石础,它们大致在同一平面上,彼此间距约略相等。发掘报告没有提供任何墓葬平面图,发掘者根据现存的 11 块石础的分布情况推测,原建筑每面有 6 块石础,四角石础公用,共有 20 础。建筑的上部已全部破坏,依报告文字介绍,石础与散水约位于同一高度,均在地表下 0.50 米左右处发现。若这些石础为暗础,则散水以内的夯土应高于散水,即墓室口部以上还有一定高度的夯土。对此,M2 尚有一定保留(详下),也可为证。另,在 M1 东北部发现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

M2 墓室之上的口字形散水用小河卵石铺成,从报告发表的墓葬平、剖面图(图六)可知,此墓的石散水并不如 M1 那样内边与墓室口边对齐,而是远大于墓室之口。因报告没有提供墓室口部尺度数据,只能依平面图所附比例估算。大致是北、东、西三面大出墓室口部较多,南面大出较少。依散水内边计,南北长约 26 米,东西宽 25 米。四面散水宽度不一,北、东两面宽 1.70 米,西面宽 1.50 米,南面不清。其中北面散水保存最好,几无缺失,可知北面没有设门。而南面大部被盗坑破坏,其中部应该如 M1 那样留有门道。散水之内是高于散水的夯土台,主要残存北面一长条,其余均被破坏。现存夯土台高出散水 0.50 米。在台面上仅残存 1 块柱础石和 2 块础石的石皮痕。若这些础石亦为暗础,则散水内的夯土台还应更高。在保存较高的台基北部,发现大量板瓦和筒瓦,似倾覆后未经过扰动,厚约 0.20~0.3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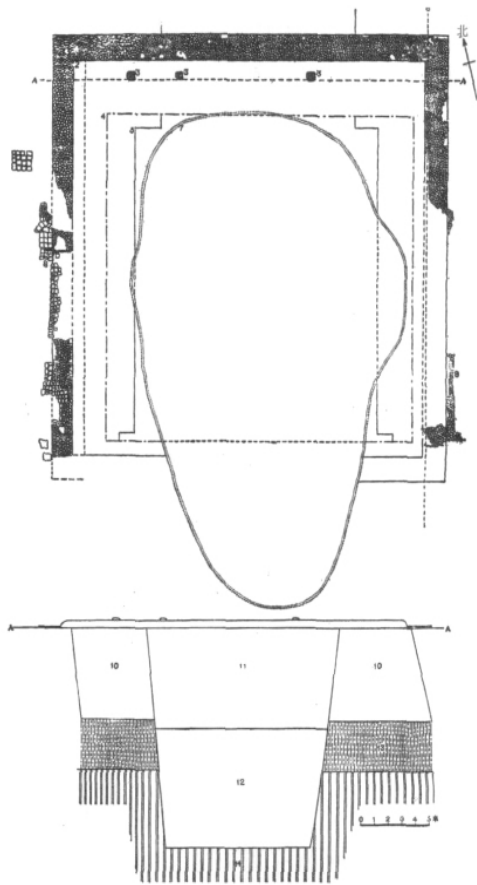
M3(图七)墓室上方口字形散水亦用小河卵石铺成,因破坏更为严重,四边散水都所剩无几,仅外边可知,内边不明,亦即四边散水宽度均无从知晓。报告说长宽均约 19 米,但从发表的平面图上测算,外边南北长约 19.30 米,东西宽约 18 米。报告所说 19 米接近于散水外边尺度。若此墓散水宽 1 米,则内边南北长约 17.30 米,东西宽约 16 米,小于上述另二墓。北部散水上发现一些绳纹瓦片。

根据固围三墓墓上建筑之残迹,可知三者东西呈线形并列,相距甚近,建筑形式相同,规模大小稍有区别,即中间一座较大,两边者稍小,但相差并不悬殊。它们都位于各自墓室正上方,其散水以内主体建筑基础部分或与墓室之口范围相等,或稍大于墓室之口。此基础部分夯打结实,并高出当时地表,形成一方台。据 M2 之残留,此台最少高 0.50 米(实际还要高些)。台的正南

方设有门,据 M1 知,门宽 2.60 米。台的四周,除南门处外,都铺有内高外低的石散水。台上立柱,下有石础。最外一周木柱近台边约 0.50 米,每边 6 根,四角者公用,共有 20 根。台中部木柱均被破坏,数目不详。柱上设顶,并以瓦覆盖。由于没有发现夯土墙或木骨墙的遗存,估计三座建筑是不设墙壁、四面通透的亭台式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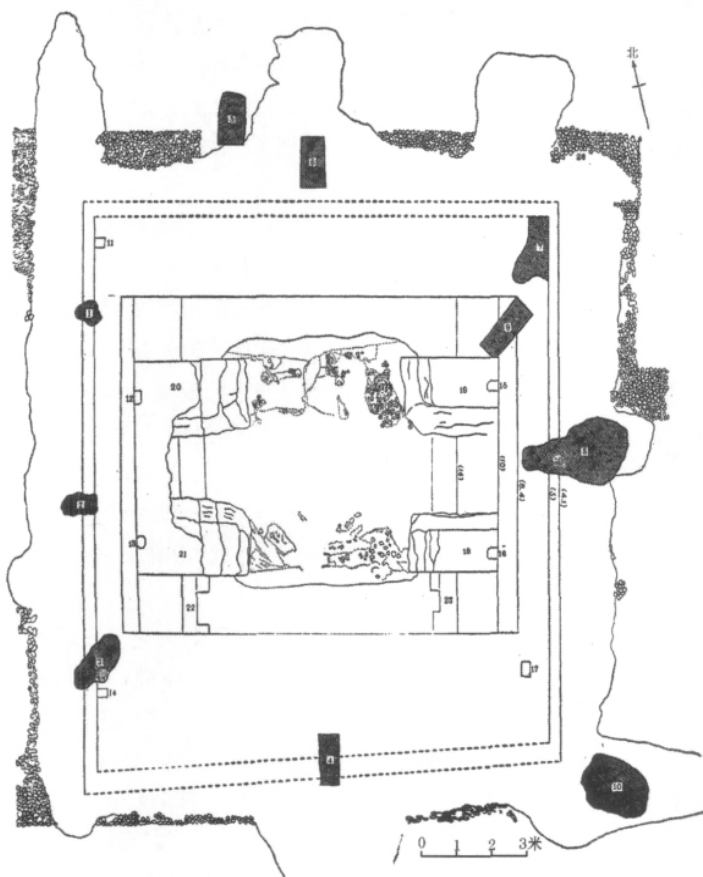
5. 圆形 如北吕周墓 V M301^[23] 墓上建筑 VF1。

在北吕墓地第五发掘区西周墓葬 V M301 上压着一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子 VF1



图六 固围村 M2 平、剖面图

1. 石子路面外线 2. 夯土台基线 3. 柱础石 4. 发掘坑
5. 坑口 6. 夯土层坑墙顶与第 1、3 号墓分界线
7. 盗坑口 8. 第 3 号墓上石板路 9. 第 1 号墓上石子路
10. 夯土层坑墙 11. 坑穴上层填夯土 12. 墓道填夯土
13. 黄色生土层 14. 红色生土层



图七 固围 M3 平面图

- 1~10. 盗坑 11~17. 木柱洞 18~21. 槨室土墩
22~23. 槨室南边的二层台 24. 接近夯土沙中所夹的虚土
25. 墓口所铺的砾石 ①铜扣 ②~⑤铅环 ⑥銍花银片

(图八)。房基保存基本完好(中部被灰坑 H1 打破),直径约 5 米。在北壁口外发现完好柱洞 3 个,各柱洞间的距离约 1.20 米左右,柱洞圆形,洞口有草泥围绕的柱圈。从地形看,房门可能开在南边,但结构不详。在房基地面之下,发现 V M301。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口底同大。墓口四角几与房基底边相切,二者如此准确套合,若非同时建成即实属万一。而且, V M301 是北吕五个发掘区中规模最大的墓。因此, V F1 可能是 V M301 的墓上建筑。但是,这种圆形半地穴式房子,在周原遗址等地都有发现,年代从西周早期到东周,但像 V F1 这样恰巧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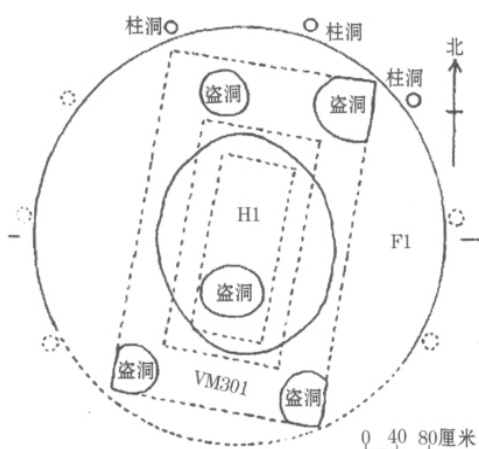
盖在墓葬之上的,仅此一例,故 V F1 是否是墓上建筑,也不是没有疑问。这里暂且按墓上建筑对待,列出供研究参考。

B 类 于坟丘上起建的墓上建筑。根据建筑的形状,可分为中字形、方形两种。

1. 中字形 墓上有长条状近中字形封土,在封土之上修建两端向外延伸的呈中字形的建筑。如新郑胡庄战国韩王陵^[24]。

新郑胡庄战国韩王陵是一对东西并列的韩王夫妇墓, M2 为韩王墓,在西; M1 为王后墓,在东。两墓上均有高大的封土,其中 M2 的封土保存稍好,其上的建筑还有残迹保留。M1 则仅存封土,建筑遗迹无存。两墓均属双墓道大墓,近同中字形,各自上面的封土也为中字形,中字形的中部与墓室相对。

M2 的现存封土高约 10 米。在封土距现地面 3 米高的半腰上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由料礓石和小石子掺合铺成的石散水,基本沿现存封土边缘铺设,平面呈中字形,但南北中间部分不闭合,平面形状与雍城秦公陵园 M37 之散水相类,即墓道上方部分是敞开的通道。散水以内是封土上半部分,现存最高点距散水约 7 米。因年久日远,自然与人为破坏难免,当初应更高。顶部原状不明,现呈弧顶,但近散水的一段为直壁,壁上可见壁柱,下有础石。从残存的部分柱灰上的红漆痕分析,当时柱子上髹有红漆。散水内侧封土立面发现有涂白涂朱现象,白色层在



图八 北吕周墓 VM301 及墓上建筑 VF1 平面图

下，当为底色，朱色层在上。

封土上局部还有塌毁的屋顶瓦砾堆积。

胡庄韩王陵的详细资料尚未发表，现知信息太少，不过，从简报发表的 M2 仅有的信息亦可略知其墓上建筑之大概：在南北向中字形封土的中部，也是封土的最高部位建有中字形建筑。建筑外围铺设中字形石散水，中字形散水的南北两端不封闭，应为升降建筑的通道处。散水以内封土夯筑，最高处距散水面在 7 米以上，其顶部当时应为中字形平台，再上构建覆瓦之屋顶。现仅知在沿散水的封土立面外侧设有木柱——壁柱，如此之高的台状封土，其上如何构建屋顶，这与封土高台的底部平面大小有关，如果面积小，单层屋顶即可。然而，已发表的资料没有散水及其以内封土台底部的面积数据，不过，M2 发表有墓室数据，知其南北长 26 米，东西宽 36.50 米，且封土全高 10 米。据此推测，散水内封土高台的底部面积不会太小，估计长、宽都在 20 米以上。若此推测不误，单层屋顶的可能极小。因为如散水内侧的壁柱直达屋顶，它需超过封土顶部平台后再往上与屋顶梁架结合。已知散水内封土台高至少 7 米，再加上台上建筑的高度，这些壁柱高度将达 10 米左右，这显然有点高了。而且封土台又不能筑成直壁，必须筑

成上小下大斜壁或台阶状方比较合理，否则壁柱与台顶平面也难以结合。因此，M2 墓上建筑的屋顶当在三层以上，即多层台阶状回廊式屋顶，有如中山王墓之墓上建筑（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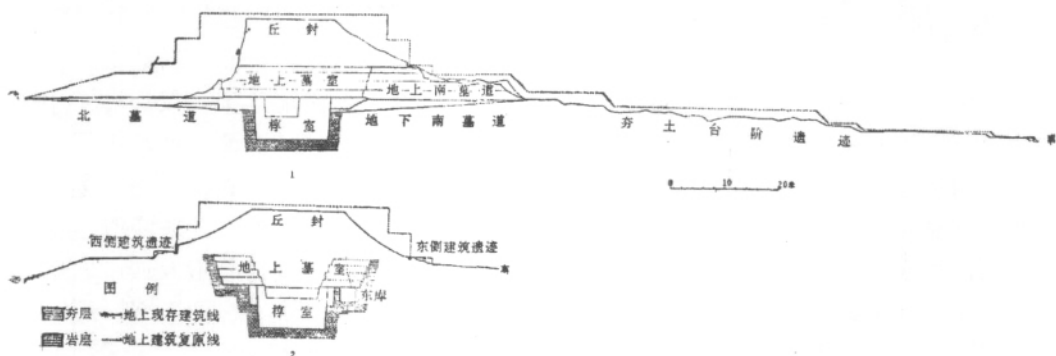
无论怎样复原胡庄韩王陵的墓上建筑，其外观呈红色立面，灰色屋顶。

在新郑郑韩故城以西分布有 10 余处韩王陵，据调查，有多处的封土是中字形^[25]，其上或附近散布有板瓦或筒瓦等建筑材料^[26]，估计其上也都有类似于胡庄韩王陵那样的墓上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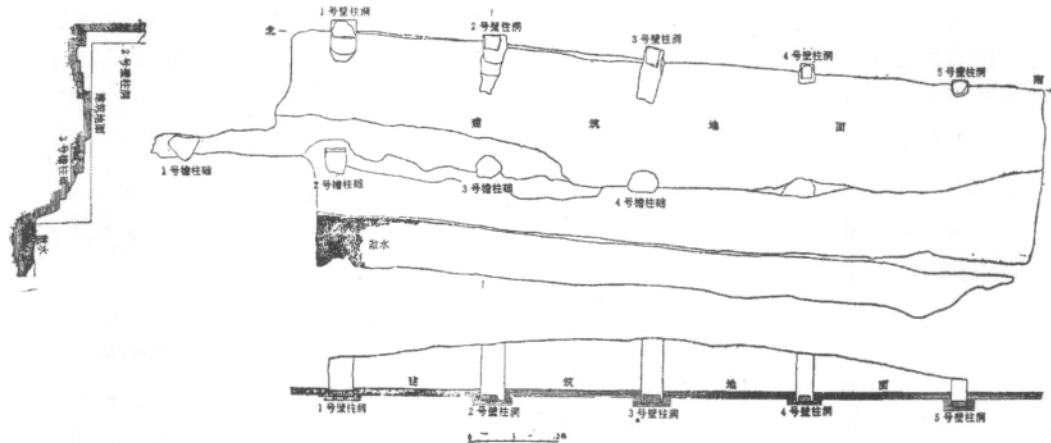
2. 方形 在封土上修建方形建筑，属于此类的有河北平山战国中山釐王之墓 M1^[27]。

中山釐王墓与其先死的王后——哀后墓东西并列，釐墓编为 M1，在西；哀后墓编为 M2，在东。据 M1 出土“兆域图”可知，王和王后墓之上统一筑有相同高度的封土，“兆域图”称为“丘”，当即坟丘，然后于坟丘之上各自墓室上方再分别筑建方形墓上建筑，分别称为“王堂”和“哀后堂”。M1 经发掘，有南北两条墓道，属中字形大墓。其封土破坏严重，仅保留方形墓上建筑东、西、南三面的小部分遗迹。墓葬发掘简报发表后^[28]，建筑专家们对其墓上建筑进行了复原研究^[29]。1996 年，M1 的发掘报告发表，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原貌提供了新的依据。

M1 的构建比较特殊，墓圻的上部为夯筑，而且其口部高出当时地表 5 米多（图九），这是很少见的。墓上的方形建筑位于墓室之上而远大于墓室口部，残存遗迹包括散水、回廊地面、檐柱洞、壁柱洞、柱础石和建筑构件板瓦、筒瓦（含瓦当）、脊饰与砖等。散水宽 1.20 米，内高外低，高差 0.05 米。若以散水外边计，方形建筑每边长 55.80 米。散水以内紧接着是回廊，回廊地面高出散水 1.35 米，宽 4.30 米。若以



图九 髡墓墓室、坟丘及墓上建筑剖面图



图一〇 髡墓西侧建筑遗迹平面、纵剖、横剖图

回廊地面外沿计，方形建筑每边长 53.40 米。回廊内侧是夯筑的回廊后壁，也是墓葬封土或方形建筑的中心部分，上部破坏，失去原貌，其顶部距回廊地面 10 米左右。（图一〇）若以回廊后壁底边计，则方形建筑每边长 44.80 米。回廊上的檐柱与后壁上的壁柱内外相对，中心点相距 3 米，是为回廊之宽。由发表的平面图上看，壁柱中心点的连线约与后壁底边对齐，即在同一直线上，由此可推知檐柱中心距回廊地面外沿为 1.30 米。回廊以内建筑的中心部分夯土高达 10 米，当然不会是直壁一直到顶。发掘报告根据其西侧底部原壁面保存较高处（最高达 1.26 米）的实况说“上部立面稍向后倾斜，壁面底涂草泥，表饰白粉”，也就是说回廊以内中心部分的立面不是垂直

的，而是斜面，即向上有收分，表面并经加工装饰，外观呈白色。但这斜面是一直斜到顶部，还是中间再设几级平台，作为中间回廊，都无法说清了。建筑专家们认为中间应该还设有回廊，至少还有一层，加上顶部主体建筑享堂之顶，屋顶至少有三层。这种推测很有道理。旁边的哀后墓（M2）也有类似建筑，只是两墓用瓦不同，哀后墓用瓦较小，王墓用瓦较大^[30]。此外，在灵寿城城内的其他中山王墓，如 M6（疑为成公墓）和 M7（疑为桓公墓）上也可能有墓上建筑^[31]。

紧接散水的回廊，北面全部破坏无存，其余三面各存少许，依残存部分可知东、西两面壁柱间距是 3.60 米（以中心点为准），南面壁柱间距是 3.34 米。据此可推算，东、

西两面壁柱各约为 $44.8 \div 3.6 + 1 \approx 13$ 根（角柱与南、北面共用），南面壁柱为 $44.8 \div 3.34 + 1 \approx 14$ 根（含共用之角柱）。由于檐柱与壁柱内外相对，故回廊四个外角处或各增加一根檐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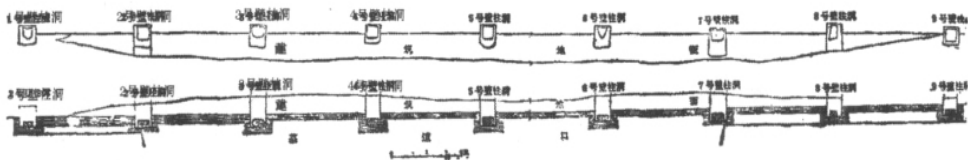
无论回廊内建筑的中心部分有无台阶，要从下层回廊登降 10 米高的顶部建筑，必须有通道。建筑专家们的以往复原，有一般之“陞”和“飞陞”、“纳陞”之说，多倾向于“纳陞”，位置在南面正中。根据兆域图陵垣上大门的位置与墓葬的方向，判断登降的陞在南面正中是合适的。且调查时在墓丘前面平台最下一级底边外的中部，发现有瓦片堆积，说明当时在这里建有门阙^[32]。据发掘报告介绍，南面回廊恰好残存少许，其中正对墓道的位置，有 6 根壁柱，等距离排列，隔为 5 间。回廊残存最宽处为 0.74 米，后壁残高 0.32 ~ 0.50 米。（图一一）这些现象表明，此建筑不是以纳陞登降，因南面正中后壁与两旁一样，也是立面，没有“纳”入的迹象。看来只能是一般之“陞”或“飞陞”了。若为一般之“陞”，则在 0.32 ~ 0.50 米高的后壁前面——回廊上应有筑“陞”之夯土基址，对此，发掘报告没有提及，应该是当初就没有。如此，最大可能是架设“飞陞”，由于正南后壁前面回廊残存太窄，已找不到“飞陞”的根据。

按 M1 出土“兆域图”的设计，M1 和 M2 的方形墓上建筑起建于同一高度的坟丘之上。而墓上方形建筑下层回廊的地面尚高出墓葬周邻当时地面约 6 米，其中应包括坟丘的高度。

“兆域图”上还设计有四个“宫”的建筑，位于坟丘的后面，即北面。因该图的规划设计未完全落实，仅埋葬了中山王 𡈼 (M1) 和哀后 (M2) 就停工了。考古发掘报告说现陵地中除发现 𡈼 王墓、哀后墓及一些陪葬小墓外，“兆域图”上的其他王后堂、夫人堂与陵垣及四个宫都毫无踪迹^[33]。据“兆域图”所示，四个“宫”依内宫垣墙外而建，其活动面远低于墓上方形建筑下层回廊地面，当起建于与“丘足”等高的平面上。也就是说，陵垣和四“宫”的起建面低于墓上方形建筑下层回廊地面近 6 米，如果在 M1 和 M2 的北面建了 1 或 2 个“宫”——“兆域图”称为“瘠宗宫”和“正奎宫”，也许还会有所残留，这需要考古工作者今后注意。

与中山 𡈼 王墓之墓上方形建筑类似的，还有河北邯郸赵王陵^[34]。邯郸赵王陵位于赵邯郸城西北十余千米，现发现 5 座陵园，均建造于小山丘顶部，坐西朝东，形制基本相同，主要部分包括陵台、封土、陵道、陪葬墓，有的还有陵垣。

陵台均以山为基，系先削平山顶，再夯筑四周，将其筑成一台面平坦的长方形高台。此陵台均南北长，东西窄，高度不一，周壁呈斜坡状，有的在斜坡上加铺石板。最大的陵台是温窑 1 号陵，南北长 340 米，东西宽 216 米。这些陵台当即中山王墓“兆域图”上的“丘”。在陵台中部夯筑一或两座方形覆斗状封土（有一座为长方形），最大的是陈三陵 1 号陵，南北长 57 米，东西宽 47 米，



图一一 𡈼 墓南侧建筑遗迹平面、纵剖面图

现存高约 15 米。经对陈三陵 2 号陵的勘探，知覆斗状封土恰好坐落在中字形大墓墓室之上。另在封土周围的陵台上发现较多砖瓦等建筑残件。因此，这些覆斗状封土应与中山王墓墓上方形建筑相同，为墓上享堂的夯土基址。在陵台之东的中部，即与中字形大墓主墓道相对应的方位，都筑有宽而长的陵道，这在他地少见。在陈三陵 2 号陵陵台的西北隅，也就是中字形大墓的后面，还发现有建筑基址，位置与中山王墓“兆域图”上“宫”的位置相当，或许性质相同。

此外，属陈三陵 3 号陵的周窑 M1 和 2006 年发掘的邯郸林村 HXM3 也有封土和墓上建筑。前者位于 3 号陵陵台下，距陵台 2.50 米，为中字形，有东西两条墓道。墓上封土已非原貌，上有许多板瓦与筒瓦残片，其上应有墓上建筑。后者不在赵王陵区，年代为战国晚期。平面中字形，墓圻的构筑与中山王厝墓相同，即墓圻上部夯筑并高出当时地表。封土上发现了“排水设施、石块组群和柱础石”等墓上建筑遗迹^[35]。这两座墓墓主身份应仅次于赵王，墓上建筑的形状根据公布资料无法推知，但由此二墓可知，战国时期赵国上层贵族比较流行在高大封土上修建墓上建筑。

在坟丘上营造墓上建筑的现象，也见于其他地区的战国墓葬，但仅有迹象而详情不明，如山西省新绛县柳泉墓地，有两组大墓的墓上有大于墓口的封土，虽在封土及周围没有发现建筑痕迹，但在两组大墓附近的地

面上散布有战国板瓦和筒瓦^[36]。山西省闻喜县邱家庄墓地也有类似现象^[37]。

二、墓上建筑的时代特征与分布

以上概括了先秦时期两类墓上建筑的发现，兹按时代将其归纳为下表（表一）：

总体来说，各时期墓上建筑有如下特点。

商代墓上建筑仅见于两处遗址，即殷墟与前掌大。可以确定的共 5 例，其中殷墟 3 例^[38]，前掌大 2 例（其中 1 例详情不明），均属平地起建，平面有中字形和长方形两种。4 例之数，在已经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商代墓葬中，可谓微乎其微。为什么仅此 4 墓有，而其他绝大多数墓，包括商王墓都没有墓上建筑，个中定有特殊原因，只是目前难以究明，成为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就此 4 例而言，所在之地均属商代重要居邑，殷墟为首都，前掌大乃商代晚期商王朝在东南边疆的重要据点。墓葬的时代，殷墟 3 例年代相近，属殷墟第二期或稍晚。而在此前与此后均不见，存在时间短暂。前掌大一例（BM4），相当于殷墟第三或四期，晚于殷墟 3 例。两地是否有传承关系，值得思考。墓主人的身份，都属于贵族阶层，殷墟 3 例中，妇好墓为大家熟识，为商王武丁之后妃。大司空 M311 被盗严重，但其规模在当时发掘的 160 余座墓葬中最大，墓口南北长 4.80 米，东西宽 4.40 米，面积为 21.10 平方米，与妇好墓规模相当（妇好墓墓口面积为 22.40 平方米），大于洹南花园庄 M54

表一 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类型

形 状 时 代	A 类 平地起建					B 类 坟丘上起建		
	中字形	甲字形	长方形	方形	圆形	中字形	方形	其他
商代	前掌大墓		妇好墓大司空墓					
西周		前掌大墓	辛村?		北吕			
东周	秦雍城	秦雍城		魏固围韩胡庄		中山灵寿、赵邯郸	晋柳泉、邱家庄	

(墓口面积 16.60 平方米) 和郭家庄 M160 (墓口面积 13.7 平方米), 墓主应属高级贵族。大司空 M312 也遭盗扰, 墓室规模没有 M311 大, 但墓中劫余之物尚有铜铙一套 3 件、铜矛 10 件、铜贝 2 件等, 还有 3 个殉人, 墓主身份也较高。前掌大 BM4 是前掌大墓地晚商时期两座中字形大墓之一, 墓主应为方国(史)国君。至于墓主性别则有男有女, 妇好墓属女性几成共识, 其他 3 墓, 一墓盗空, 2 墓在劫余之物中有兵器。据殷墟西区大量墓葬性别鉴定结果, 凡出兵器者均为男性(妇好墓也出兵器, 特殊)^[39]。故其他 3 墓不会都是妇好类人物, 应有男性。

西周有 6 例, 与发掘的大量西周墓相比, 数量也可谓少之又少。这 6 例也都很特别, 其中前掌大的 4 例, 只有 1 例(M205)可以肯定墓上是甲字形建筑, 1 例(M207)可能为长方形, 另 2 例(M203 与 M206)不明形状。它们均属西周早期, 应是本墓地商代晚期墓上建筑的延续。还有两例就是辛村 M1 和北吕 V M301。前者是否确有墓上建筑, 难以肯定, 上文已有说明。辛村 M1 是一代卫侯墓, 属姬姓高级贵族墓, 在已发掘的大量西周诸侯级墓葬中(有不少为姬姓), 无一发现有墓上建筑, 因此, 辛村 M1 很可能没有墓上建筑。北吕墓地, 大家普遍认为属姬周墓地。如此看来, V M301 的墓上建筑便成为周系墓葬中唯一的一例, 而且形制与结构特殊, 为圆形半地穴式。这种形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见的墓上建筑中也是唯一的。

总之, 在西周时期, 除商系前掌大墓地极少数高级贵族墓沿用墓上建筑外, 其他地区基本不见墓上建筑, 北吕 V M301 属孤例。可以说, 西周无墓上建筑之俗。

东周时期墓上建筑比较多见, 但春秋时期仅见于陕西雍城秦公陵园, 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墓上建筑为平地起建, 形制与墓圻相

类, 有中字形和甲字形两种。墓主均属秦国最高等级的贵族, 中字形者为秦公, 甲字形者当仅次于秦公。

到战国时期, 尤其是战国中、晚期, 墓上建筑在关东部分地区流行起来, 主要是三晋地区, 现知有晋、赵、魏、韩、中山国等。本阶段两种类型的墓上建筑都有, 比较而言, 平地起建者少, 有固围魏墓; 于坟丘上起建者多, 有邯郸赵墓、新郑胡庄韩墓、中山王墓以及新绛、闻喜晋墓等。建筑的形制有中字形和方形两种。这些墓主的身份, 大部分属王与王后, 个别属仅次于王的人物。前者上文已有论及, 后者如邯郸林村 HXM3 和新绛柳泉两组大墓^[40]。由此可知, 在战国中晚期, 只有某些国家的高级贵族死后才可设有墓上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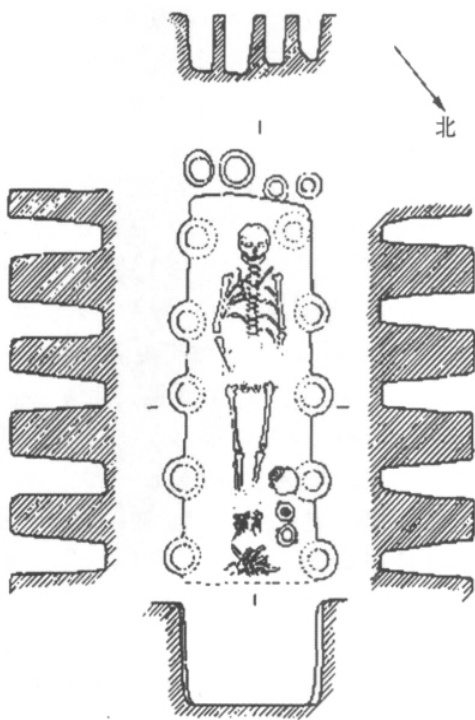
但是, 已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高级贵族墓很多, 不少还有高大的坟丘, 可其上并非都有墓上建筑, 很多是没有的。如长江中游的楚系墓葬, 规格高的普遍有坟丘, 可以说比任何地区都多, 却未见一例有墓上建筑。长江下游徐淮地区的墓葬, 西周以来就流行土墩墓, 也未见有墓上建筑。东方的海岱地区, 如齐国, 在临淄城东南有多处高大的田齐王陵, 也不见有墓上建筑。北方地区, 如燕国, 在燕下都城内的九女台和虚粮冢墓区, 有较高坟丘的墓葬多达二十余座, 也均无墓上建筑。可见, 在这些地区虽坟丘普遍, 但其上并不兴建任何建筑。就目前所知, 墓上建筑乃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含中山)的特征, 其他地区则不然。

三、墓上建筑的源流

关于墓上建筑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与陕西凤翔县大辛村龙山文化墓葬 M3 有一定的渊源关系^[41]。除大辛村 M3 外, 在殷墟妇好墓以前, 尚未发现其他墓上建筑, 故将两座墓的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所难免。但从龙山文化到商代晚期之间年代久远, 而且

二者地域相距也不近,说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证据似显不足。

龙山文化的墓葬目前发掘的比较多,有墓上建筑遗迹的,仅大辛村 M3^[42](图一二)一座。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规模不大,长 2.30 米,宽 0.82 米,深 0.60 米,方向 280°。墓穴东西两壁各有柱洞 5 个,排列有序。柱洞口径 0.18~0.26 米,底径



图一二 凤翔大辛村 M3 平面图

0.08~0.10 米,深 0.60 米,底与墓室底平齐。墓室北端未发现柱洞,南端墓室口外有柱洞四个,口径与墓室两侧的近似,深 0.30~0.34 米。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两手交置腹部,为男性成年人。随葬陶器有双耳罐 2 件,单耳罐 1 件,均置于足部左侧;另有猪下颌骨 10 块,成堆置放于足下部。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此墓规格都不高,也无其他特殊之处。为何唯此墓有墓上建筑?其原因、性质、含义都不明确,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还不宜把它与商代晚期墓上建筑相联系。

至于晚商墓上建筑的源头,目前的材料还不能找出合理的答案,很可能也是一种短暂存在的特殊现象。此后,除前掌大殷遗墓外,它也未得到西周时期各族系的继承。

墓上建筑的再度出现,是春秋时期秦雍城之南的秦公陵墓。有学者从墓葬制度上考察,认为秦陵与殷陵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秦陵墓上发现的建筑遗迹,可能与妇好墓的“享堂”相类,两者之间有承袭关系^[43]。凤翔秦公陵园的墓上建筑基本继承了商代墓上建筑的形式^[44]。但秦都雍始于公元前 677 年,相当于春秋早中期之际,上距商代尚有数百年。而且早于雍城秦陵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已经过考古发掘,不论是两位秦公还是一位秦公及其一位夫人之墓,最少有一位秦公是可以肯定的,两座墓上都没有发现墓上建筑。若秦承于商制,既然春秋中期秦陵有了墓上建筑,则春秋早期的秦陵也应该有墓上建筑,可实际不然。因此,视晚商墓上建筑为秦陵墓上建筑的源头,理由也很勉强。

雍城秦陵墓上建筑再度出现以后,理应延续和发展起来。可战国秦陵已经找到,如临潼芷阳秦东陵,考古工作者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和勘探,四个陵园中发现四墓道大墓 3 座、中字形大墓 2 座、甲字形墓最少 4 座,在已发表的所有考古调查和勘探报告中,无一提到有墓上建筑遗存^[45],多数研究者也认为芷阳秦陵没有墓上建筑^[46]。但也有学者根据在 1 号陵冢顶上捡到的两块瓦当残片和对陵西“王路”位置的分析,认为无建筑的结论下得为时过早,倾向于可能有墓上建筑^[47]。分析调查钻探简报提供的秦陵墓葬平面图,可知当时对墓葬的钻探是比较细密的,甚至连墓道中的耳室都探了出来。如果有覆瓦的墓上建筑,必然会有较多的瓦砾堆积,也会有散水、柱础石等,可这些遗存在各墓上均未探出,因此,芷阳秦陵没有墓上建筑的可能性最大。稍后的始皇

陵,也没听说在坟丘上有墓上建筑。可见春秋时期秦陵的墓上建筑之俗,未被战国晚期秦陵所继承。

战国晚期秦陵不见了墓上建筑,可在三晋地区却流行开来。原来存在的地区消失了,原来没有的地区却出现了。二者是否有传承关系?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即使在战国晚期,墓上建筑也并非在各国普遍存在,它只见于三晋地区部分诸侯国。所以,在论述先秦时期墓上建筑时,切不可偏概全,以为此时相当流行。

墓上建筑在西汉时期消失,西汉的帝王陵均未发现墓上建筑,这也许是汉承秦制的一个方面。

四、墓上建筑的等级与性质

晚商的几例墓上建筑,均属贵族,但等级最高的商王墓却无墓上建筑。何以如此,原因不明,需进一步探讨。但这种现象说明,有无墓上建筑,即使在贵族中,也不是绝对由等级高下决定的,当另有原因。

西周基本不行墓上建筑,仅见的一例(北吕 VM301)属普通贵族(前掌大 M205 属商系贵族墓)。

东周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目前发现的属于东周时期的墓上建筑,均为高级贵族。这些高级贵族墓,又可分两个级别,最高级是各个诸侯国国君:如春秋的秦公大墓;战国的邯郸赵王陵、许岗与胡庄韩王陵、中山王墓、固围魏王墓等等。第二个级别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人物:如邯郸赵王陵区的周窑 M1、赵王陵南面的林村 HXM3 和新绛柳泉两组大墓等。除以上两个级别外,其他等级的人就不设墓上建筑了。这表明东周时期秦与晋地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墓上建筑已被赋予等级含义,是身份等级的一种象征,只有高等贵族死后才可以使用墓上建筑。

关于墓上建筑的性质,以往学者讨论很

多。最初是由中山王墓的发掘引起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山王墓的墓上建筑与“兆域图”所述相符,该墓的墓上建筑即“兆域图”上的“王堂”,其性质是用于墓祭,称之为享堂,并认为晚商的几例墓上建筑也与中山王墓相同,都属墓祭的享堂,汉代人所谓“古不墓祭”的说法是错误的^[48]。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49],认为先秦墓上建筑不是用于祭祀的享堂,“适墓不登垄”,汉人所谓“古不墓祭”是事实。这些墓上建筑是“陵寝”的“寝”,是墓主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

讨论的关键涉及到“墓祭”问题。反对墓上建筑用于墓祭的学者,认为墓祭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不在墓上进行^[50]。再往以前还没有出现墓祭,属“古不墓祭”的“古”代了,如对殷墟王陵区大量祭祀坑的解释。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战国以前,墓祭确已出现,如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晋侯墓地大量祭祀坑的发现。对此,李伯谦先生已有论述^[51]。本世纪初,在位于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东南的土岭上又发现一处晋侯墓地——羊舌晋侯墓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其中的一组两座晋侯夫妇墓,时代属春秋初年。两墓(M1和M2)东西并列,均为“中”字形,其规模与天马-曲村晋侯夫妇墓相当而略大。二墓均有积石积炭,均在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发现大量祭祀坑,位置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者相同,唯数量更多,共有227坑。这些祭祀坑互有打破关系,表明非一次形成。坑内牺牲有马、牛、羊、狗和人等^[52]。羊舌墓地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在春秋早期晋国仍有墓祭存在。当然,这种以坎埋牲的祭祀形式延续到何时,因羊舌墓地之后的晋公墓尚未确定,目前难以知晓。但西周和春秋时期存在墓祭是可以肯定的。看来,所谓“古不墓祭”的古代,不能包括周代。既然如此,战国时期墓上建筑是用以祭祀的性质便不能

用“古不墓祭”来否定。若与此前有区别，那也是祭祀形式的变化，这需要新的考古资料予以证明。

(本文写作中承蒙刘绪老师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56~61.
- [2] a.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 文物, 1983, (7): 36.
b.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文物, 1987, (5): 63、64.
c. 国家文物局. 2009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73.
- [3]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文物, 1987, (5): 60、61.
- [4] 根据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推知, 秦公陵区的大墓很可能如同一号墓那样均遭受无数次盗掘, 若果真如此, 则 M37 墓室散水内还会有很多盗迹存在, 发掘简报公布的夯土墙平面图就更有疑问了.
- [5] 也许装有木质活动门.
- [6]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 文物, 1983, (7): 31、32.
- [7] 国家文物局. 2009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74.
- [8]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文物, 1987, (5): 64.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67~69.
- [10] 报告还指出, 除了 BM4 和 M205 外, “在北Ⅱ区 M203、M206 和 M215 上口四角残留有 2~3 个柱洞, 看不出对称关系. 推测这些墓上也可能有过地面建筑物, 但现在已经大部分被毁.” 由于这几座墓葬的平面图上并无柱洞痕迹, 文字描述中也没有提到柱洞详情, 故这三座墓不在讨论之内.
- [11]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 文物, 1987, (5): 64.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5~7.
- [13] 马得志等. 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9), 1955: 68、69、78、83.
- [14] 关于殷墟的分期, 本文采用邹衡先生的结论.
- [15] 此第四期灰坑 H1 也许属西周初年.
- [16] 马得志等. 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 考

古学报, (9), 1955: 87.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浚县辛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14.
- [18] 王世民. 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 考古, 1981, (5): 460.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浚县辛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20.
- [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丛书(80). 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65.
- [21] 胡秉华. 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浅析. 考古, 1994, (2): 151.
- [2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辉县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69~99.
- [23] 罗西章. 北吕周人墓地.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86~88.
- [24] a. 马俊才, 张明立. 新郑胡庄墓地发掘获重大发现. 中国文物报, 2009-03-27 (5).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 华夏考古, 2009, (3): 16、17.
- [25]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 华夏考古, 2009, (3): 16.
b. 宋国定. 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7.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87.
-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 新郑县辛店许岗东周墓调查简报. 中原文物, 1987, (4): 65~68.
-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髡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3~22.
- [2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 文物, 1979, (1).
- [29] a. 傅熹年. 战国中山髡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 考古学报, 1980, (1).
b. 杨鸿勋.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 考古学报, 1980, (1).
以下引用建筑专家的看法, 均采自此二文.
- [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髡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501.
-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119、122.
依本报告, 城内王陵 M7 的墓上建筑封土, 亦基本呈方形, 从上而下分三级台面, 可供复原时参考.
-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髡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22.
- [3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髡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10.

- [34] a. 河北省文管处, 邯郸地区文保所, 邯郸市文保所. 河北邯郸赵王陵. 考古, 1982, (6): 597 ~ 564 .
b. 段宏振. 赵都邯郸城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41 ~ 148 .
-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7. 北京: 文物出版, 2008: 161、162 .
- [36] 杨富斗等. 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 晋都新田.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48 .
- [37] 刘绪. 晋文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42 .
- [38]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 M54 之上也发现了一座房址 F1。F1 平面略呈长方形, 未发现墙基或基槽遗迹, 但发现了排列整齐的柱础石。F1 略大于其下叠压的 M54, 恰好在墓口之上, 报告认为其与 M54 均属殷墟二期偏晚阶段。但 F1 自南向北倾斜, 打破 M54 墓口。从妇好墓与其墓上建筑的关系来看, 二者并无打破关系; 而其他各时期墓上建筑与墓葬之间亦无打破关系。花园庄 M54 之上的 F1 是否为墓上建筑尚有待商榷。故本文未予讨论。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 ~ 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79, (1): 118 .
- [40] 有学者依新绛柳泉两组大墓墓室规模、残存随葬品等, 认为属晋公墓。但这两组大墓都无墓道, 与晋公身份不合。
- [41] 王志友. 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类型及演变. 陇右文博, 1999, (1): 32 .
- [42] 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县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5, (1): 2、3 .
- [43]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 文物, 1983, (7): 37 .
- [44] 王志友. 从先秦墓上建筑的台基到汉代帝陵的堂坛. 四川文物, 2001, (3): 27 .
- [45]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 考古与文物, 1987, (4) .
b. 张海云, 骆希哲. 秦东陵勘察记. 文博, 1987, (3) .
c.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0, (4) .
d.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3, (3) .
- [46] a. 王学理, 梁云. 秦文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172 .
b. 张海云、孙铁山在《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提到, 参与秦东陵调查发掘的程学华指出, 秦东陵墓葬“封土以上并无享堂一类的建筑”。见程学华. 秦东陵考察述略.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 1992, (1) .
- [47] 张海云, 孙铁山. 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 考古与文物, 1996, (5): 31 .
- [48] a. 杨鸿勋.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 考古学报, 1980, (1): 137 .
b. 杨鸿勋. 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 考古, 1982, (4): 402 .
c. 杨鸿勋. “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 考古, 1983, (8): 739 .
- [49] a. 杨宽. 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 文物, 1982, (1): 32 .
b. 杨宽. 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 考古, 1983, (7): 636 .
- [50]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7、118 .
- [51] 李伯谦. 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 考古, 1997, (11): 58 .
- [52] a. 吉琨璋. 山西曲沃羊舌发掘的又一处晋侯墓地. 2006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69 ~ 74 .
b.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曲沃县文物局. 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 2009, (1): 7、13 .

(责任编辑: 李素婷)